

中法文化的“摆渡人”

——写在法中建交60周年之际

□董纯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我和沈大力，跟法国雕塑家保尔·贝尔蒙多和他的儿子，也就是中国观众熟悉的电影明星让-保尔·贝尔蒙多有过密切接触。今年是法中建交60周年，我回忆起与这两位法国文化名人生前的交往旧事，十分感怀他们对中国的深深情谊。

贝尔蒙多与周恩来纪念雕像

让-保尔·贝尔蒙多的父亲保尔·贝尔蒙多是一位杰出的雕塑家。巴黎第13区戈德弗鲁瓦街一家旅馆门前的周恩来浮雕像，正是这位法国艺术家的作品。他为中国总理周恩来雕塑的气宇轩昂的浮雕像，充分体现了法国古典和谐的艺术传统。

1978年，《周恩来传》的作者、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依据中国总理周恩来上世纪20年代初曾一度旅居巴黎第13区戈德弗鲁瓦街的史迹，向巴黎市政府提出在周恩来故居门前安放一尊纪念胸像。这家旅馆位于巴黎市意大利广场附近一条窄街里，是一幢三层楼房。1922年至1924年，周恩来在巴黎勤工俭学期间，住在三层楼右边一间陋舍里，组织起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2001年，这家旅馆被爱国华人购置。

时任巴黎市市长的希拉克欣然接受女作家韩素音的提议，选择了被认为最有才华的雕塑艺术家保尔·贝尔蒙多承担雕塑周恩来头像的特殊任务。时间紧迫，巴黎当局给出的时限仅十来天，还要给铸模造型的两位艺人卡普里和迪诺留出两天。中国驻法大使馆提供的是一张周恩来总理的正面标准照片，而对一位雕塑者来说，侧面雕塑成功率比较高。贝尔蒙多不顾困难接受了这项任务，显然是出于对中国总理异常景仰的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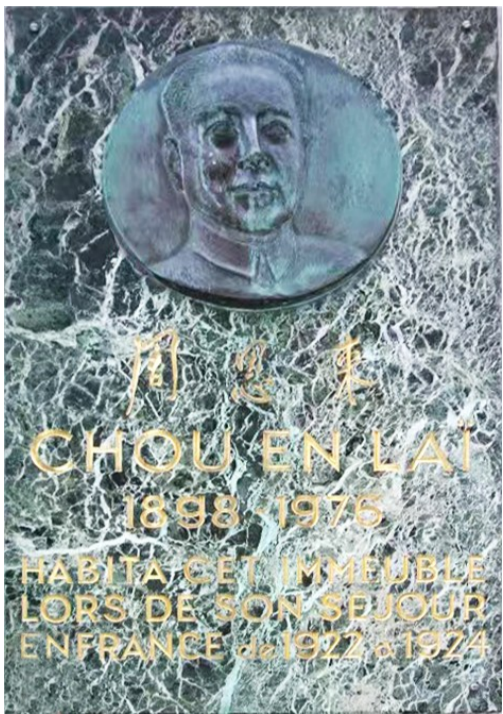
当时，作为保尔·贝尔蒙多的好友，沈大力多次到雕塑家的工作室造访，亲眼看到他为雕塑绘制多幅周恩来素描，并据此塑造的一个个圆形浮雕章，目睹他完成周恩来头像雕塑的全过程。保尔·贝尔蒙多对沈大力说：“我要雕出周恩来的真实肖像，特别想要重现他的生命力。为此，需要从不同角度审视，从十几幅素描中进行比较选择，力求让更多的光线投射到他的脸庞。通过明朗的形象，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魅力。”

他还说：“我有幸跟周恩来总理同龄。可惜他早逝了。过去，我通过阅读书刊了解到他的人格，这次能为他塑像，感到异常荣幸。我是怀着双重兴趣接受这次任务的。首先，我崇拜这位伟人。周恩来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爱戴，而且也为法国人民所景仰。另外，为他塑像是一项创作，颇具挑战性。”

平日里，贝尔蒙多一大早就起来到街角的咖啡馆喝一杯咖啡，然后到丹佛尔·罗斯霍林荫道的雕塑作坊，穿一件朴素的白色工作衣干活。他说自己一不工作就会感到烦恼，所以周末从不歇息。在巴黎这样的华都，老艺术家过着简朴淡泊的生活，高龄也不雇人服侍。朋友们看到他的工作室里连暖气设备都没有，冬天靠自己生煤炉取暖。在贝尔蒙多看来，艺术家若是沽名钓誉，那就是没有灵魂，不成为艺术家了。

贝尔蒙多终身埋头艺术创作，曾为高乃依、米什莱、普鲁斯特和特洛亚、安东尼·瓦托，以及戴高乐等名人造像。其大型雕塑分布在首都巴黎、外省南锡、图卢兹和尼斯等许多城市的街道和广场，甚至远至北非，诸如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一些城市，作品融入公共建筑的组成部分。在贝尔蒙多的工作室里，可见到他雕塑的塞纳河女神塞涅娜、奥尔良的维纳斯，以及非尼基公主欧罗巴塑像。

1979年10月16日下午四时，巴黎意大利广场举行周恩来总理纪念浮雕揭幕典礼。那一天，时任法国总统德斯坦发表讲话。贝尔蒙多不愿在公众集会场合露面，当天凌晨，他曾独自漫步到戈德弗鲁瓦街旅馆前，一个人静悄悄地审视



巴黎戈德弗鲁瓦街的周恩来浮雕像

自己创作的周恩来纪念浮雕，流进许久才离去。事后，他听中国作家们说他雕的周恩来头像比原照片上显得更年轻，深感欣慰，说：“如果是那样，我就太幸福了。不过，我总觉得这回时间过于仓促，不然，我可以塑一座周恩来总理的全身像，体现他的伟大。”

贝尔蒙多称赞中华民族的文明。中国代表团访法期间，他从电视上看到中国北魏云冈石窟的纪录片，对洞窟中姿态万千的佛教造像赞叹不已，认为其是生动表现人物心理的杰作。他称赞“中国佛教石刻艺术是世界雕塑的顶峰”，非常想亲眼去看云冈石窟，向沈大力表达了自己热切的愿望。沈大力回北京面见时任中国文联主席周扬，转达了这位法国雕塑家的心愿。周扬立即批示中国文联，邀请贝尔蒙多访华，安排他去现场观赏佛像。中方方向保尔·贝尔蒙多发出正式邀请函，并做好了一切接待的准备，让他兴奋不已。他告诉沈大力，行前打算把自己雕塑的周恩来像做成铜质纪念章，在背面刻一句反映周总理精神的格言，留待访华时赠送给中国民众留念。

然而，在保尔·贝尔蒙多登机前几天，他的家人担心一个八旬老人乘坐远程飞机可能会出意外，他的云冈石窟之旅最终未能成行。1982年元旦，保尔·贝尔蒙多与世长辞，享年84岁，埋葬在巴黎蒙巴纳斯墓地离萨特墓不远的地方。

让-保尔·贝尔蒙多：
法国影史“新浪潮”的先锋

保尔·贝尔蒙多的儿子让-保尔·贝尔蒙多十分孝敬父亲。父亲的敬业精神和毅力极大地影响了他。让-保尔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工作狂。他问父亲：“您为什么反复去卢浮宫啊？”父亲回答：“我要学习啊，儿子。”1967年，父子俩应邀前往爱丽舍宫，让-保尔站在父亲身旁。戴高乐将军对年轻人说：“我很喜欢您父亲的作品。对您来说，小伙子，一切才刚刚开始呢。”父亲辞世时，面对巴黎媒体的冷漠，他愤慨地说：“我父亲是法国当代大雕塑艺术家，离世没有多少人关注。而我只不过是个普通演员，竟受到全社会如此过分的追捧，也太不公平了！”

在对这位法国影坛明星的一次采访中，我深感到他对父亲的深情。那是1995年的秋天，上海电视台为拍摄电视文献纪录片《巨人的足迹》来到巴黎，寻找周恩来于上世纪20年代初在勤工俭学期间留下的旧迹。他们获悉法国巴黎第13区的戈德弗鲁瓦街一家旅馆门墙上有一块周

恩来雕像，就把它列入了拍摄项目。我帮助摄制组联系上让-保尔·贝尔蒙多，请他介绍老雕塑家当年制作周恩来头像的详情。

采访当日，摄制组一行来到位于巴黎第二区的“游艺剧场”。上海的朋友强调，国内观众喜欢贝尔蒙多演的电影，尤其是《王中王》，他们今天能有幸一睹风采，异常愉快。我为摄制组担任翻译，让-保尔态度和蔼，直接问我，自己坐的位置是否合适，如同他出道时跟老影星伽班配戏，请教应该怎样做动作那般谦卑。然后，他向中国客人娓娓道出，谈起自己父亲的中国情：“家父得知中国大使馆委托他雕塑周恩来头像，感到非常自豪。那几天，我们全家人都成了‘中国迷’，饭桌上谈的全都是中国话题。”

采访中，小贝尔蒙多还回忆道：“父亲自从接受了为中国领导人塑像的任务后，整日凝神聚思，考虑如何造型。一天，我母亲玛德莱娜见父亲冥想入神，轻声问道：保尔，你在想什么呀？他如梦初醒，答道：我在想周恩来。”

让-保尔·贝尔蒙多的话语句句触动在场每一个中国客人的心扉。采访结束后，他感谢中国影迷对自己的厚爱：“我最大的愿望是让中国人了解我父亲的作品，有一天能在北京或上海为他办个展览。他是真正的艺术家，我不能算！”

保尔·贝尔蒙多夫妇对子女抱有厚望。据保尔·贝尔蒙多说，儿子让-保尔自幼喜欢表演艺术，常常组织周围的小伙伴们排戏。可是不少人对他冷嘲热讽，咬定他“其貌不扬”，不适合演戏。他进入国立戏剧学院后备受歧视，连老师都说：“你长得这副德行，不招女人喜欢。”母亲玛德莱娜听说后，鼓励儿子向父亲学习，像他一样有勇气，不懈努力。

历史确有讽刺意味，后来连第一个007邦女郎都对慷慨谦逊、充满活力的让-保尔·贝尔蒙多芳心暗许，父亲为当了电影演员的小儿子自豪，称赞他“用艺术为劳苦终日的工人大众提供娱乐”。他的小女儿米莉尔则成了芭蕾舞明星。

让-保尔·贝尔蒙多是在法国最得民心的电影演员之一。他首先是法国电影史上“新浪潮”的先锋。1960年，他在先锋派导演戈达尔执导的影片《精疲力尽》中扮演一个小混混，那个挑战墨守成规的角色，掀动起一股浪潮，显示出不同于“耶耶派”的新颖法兰西风格。《精疲力尽》被誉为“新浪潮”的宣言。《快报》杂志不吝篇幅，称贝尔蒙多是“一头天才的奇异神兽”。

像父亲一样，让-保尔·贝尔蒙多对待自己从事的艺术事业全力以赴，将毕生都贡献给了电影和戏剧艺术。他在世88个春秋，总共拍摄了80部影片。

自1960年起整整60年间，让-保尔·贝尔蒙多活跃在法国银幕上，在他参与拍摄的大部分影片里，一贯以生动的语言，以纯洁、活泼、乐观、友善、慷慨的形象示人。遇到影片中有打斗等风险或特技场景，例如从直升飞机跳到游船上，攀爬大坡度屋顶、奔跑在飞驰的火车顶上等等，他都事必躬亲，不要替身。虽然他体魄强壮，但这种不向困难屈服、敢于挑战极限的拼搏精神在影坛是独一无二的。为此，观众不仅高度评价他的演技，还感谢他给电影带来勃勃生机和生活的乐趣。难怪他的父亲骄傲地对友人说：“让-保尔拍的电影，为公众带来快乐。”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十分重义气的人，视友谊高于一切。

1991年，小贝尔蒙多在布洛卡导演执导的巴黎第2区林荫道闹市的“游艺剧场”，便于自己在不拍电影时常常登台戏剧舞台，直至2004年。他用电影和戏剧作品引起法国民众的共鸣，举一个非常动人的例子：贝尔蒙多在布洛卡导演的影片《里约汉子》里饰演一个跌打滚爬、演示多种惊险特技的角色亚德里安。在巴黎上映时，银幕上一名暴徒正要背对观众暗算亚德里安，观众席上一个小女孩突然高声尖叫：“让-保尔，当心呀！”孩子

忘记了偶像是在演电影，流露出一片可爱童稚的善心，引起全场哄堂大笑。演员能如此深切地活在观众心里，实不多见。

2011年，戛纳电影节为78岁高龄的让-保尔·贝尔蒙多颁发了“终身事业金奖”，表彰他对电影艺术的杰出贡献。

他曾在科西嘉岛友人家突然中风，被紧急送往医院，由此每况愈下，不得不告别演艺生涯，直至在巴黎逝世。他生时曾说，自己的理想是“死在舞台上，晚一些最好”。还说：“我确信，人能以另一种形式再生”。

他的这一愿望今天确已实现：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一侧，位于空中地铁高架桥下的比尔·哈凯姆桥于2023年4月更名为“让-保尔·贝尔蒙多休闲道”，以纪念这位2021年去世的明星。如今，这座俯瞰塞纳河的金属柱铁桥已成为巴黎风景名胜，游客络绎不绝，来自世界各地的情侣纷纷在此拍照留影。

法国汉学的薪火传承

不同于官方交往，我们与贝尔蒙多父子的交往属于两国民间的个人交往，非常令人难以忘怀。2024年恰逢中国龙年，初春的巴黎正沉浸在法中建交60周年的友好气氛中，中国与法国的来往，可以上溯至太阳王路易十四和中国康熙皇帝时代。尽管当时仅限于宫廷，但这样的交流丰富了法兰西王国的文学艺术景观，并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在18至19世纪的法国，中国题材已开始不断出现在法国的文学和绘画作品中。安东尼·瓦托和弗朗索瓦·布歇被称为法国的“中国画家”，二人都把中国作为重要的创作源泉。凭借着非凡的才华和对东方艺术的强烈求知欲，瓦托通过《中国音乐家》，布歇以《中国花园》等新颖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想象中的中国，让法国人对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有了更多了解。

法国的“中国诗人”保尔·克洛岱尔、圣琼·佩斯和维克多·谢阁兰，后者以研究充满东方神秘主义的著作《石碑》而闻名。法国大诗人泰奥菲尔·戈蒂埃之女朱迪特的贡献则更为突出。她天资聪颖，在中国秀才、家庭教师丁敦龄的引领下学习汉语和中国古典诗词，很快明确了自身崇仰东方文化和艺术的志向，其后为中国文学在法国的传播作出了不容抹煞的贡献。

1867年，朱迪特出版《白玉诗书》，辑合了近百篇她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其中有李白、杜甫、

苏东坡和李清照的作品。她在《序言》里赞美中国是“一个为诗人建立庙宇的圣地”。诗集旋即转译成德文、丹麦文和英文，给欧洲浪漫派音乐大师马勒的第九交响乐《大地之歌》注入了神秘的灵感。《白玉诗书》初版，朱迪特署上自选的汉语笔名“俞第德”，将之题赠给雨果。雨果读后写信给她：“您的文笔有力而优雅！远赴中国，形同奔月。您引导我们进行的是一次星际旅行。”

朱迪特一生中写了许多中国题材的作品。像伏尔泰从《今古奇观》里取材写《查狄格，或者命运》一样，她从中国文明中汲取灵感。朱迪特谈论中国时，表现的是她同中华民族水乳交融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在她以首位女院士身份被接纳进入塞纳河文学院时，朱迪特宣称：“我是一个新生的中国公主。”

朱迪特对中国感情真挚，促使她成为法国汉学史上的薪火传承者。35岁那年夏天，她在迪纳尔海滩遇到8岁的邻居小男孩乔治·苏里耶-德莫兰，热心教他学起了汉语。十余年后，她的努力结出硕果，乔治进入巴黎东方语言文明学院，最后成为汉学家，写下30多本散文、小说和戏剧作品，如《杨贵妃》《孙悟空》《中国艺术史》等。乔治·苏里耶-德莫兰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将中国针灸介绍到了欧洲，著有《中国针灸大全》，至今在法国乃至欧洲流传。

人们今朝欣喜地看到，在东西方悠久的交往历史中，已有越来越多属于不同文明国家的人在为促进双方互相了解，加深感情而努力充任文化“摆渡人”。法国诗人雅克·普雷维尔曾在首题为“乡土色彩”的诗中歌颂“长城的燕子”，在另一首题为《蚕丝》的诗中，他这样描述“丝绸之路”：

正因为此，
在一个有自尊的世界上，
应该为纤细的天来之丝
竖起一座牌坊。
那片白蚕桑叶
织出第一根银丝。
穿越整个华夏大地……
去到印度，
远赴意大利，
降临法兰西。
沿途璀璨神奇
让纯真少女满心欢喜……

(作者系法语文学学者)

汉学家杜博妮：我为什么翻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徐宝锋 刘佳熹

杜博妮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1972年至1990年，她先后在悉尼大学、伦敦大学、哈佛大学等汉学研究重镇从事教学、翻译和汉学研究。1990年，她成为英国爱丁堡大学首位中文教授。杜博妮的研究生涯整合了汉学研究、文学翻译、她第一个系统提出汉英文学翻译理论的汉学翻译家，她翻译了多部著作，在汉英文学翻译界深具影响力。

1958年，杜博妮被澳大利亚共产党派到中国，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中文。自此，杜博妮对汉语着迷，回国后她继续在悉尼大学学习中国文学，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75年，杜博妮前往伦敦大学，专门研究朱光潜的写作方式和朱光潜对文学批评的见解。后来，杜博妮在法国阿尔萨斯大区北部城市斯特拉斯堡，也就是朱光潜获得博士学位的地方，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人共同研讨了朱光潜的学术历程与学术著作。197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杜博妮选择来到中国，在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帮助下进入外文出版社工作。杜博妮感慨道：“这是我生命

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杨宪益和戴乃迭都是非常好人，给予了我很多学术研究上的指导和生活中的帮助，他们是汉英翻译的泰斗，是一对非常杰出的夫妇。”杜博妮还谈道：“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期间，同事们都很友好，帮助我更加深刻理解了中国文化，我的中文也进步得特别快。我也和后来的外文出版社领导者黄友义成为很好的朋友，他是我熟悉的翻译家之一，他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做得十分出色。”这段工作经历，让杜博妮深入了解了中国文化，理解了中国人，她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1984年至1986年，杜博妮来到外交学院教书，并从事翻译与写作。这一时期，杜博妮翻译了阿城的作品，还去过西双版纳，参加了电影《孩子王》工作室的会议。后来，杜博妮离开中国，去往挪威，但她依然非常想念中国，一直觉得必须要回到中国，她已经很难把自己从中国分离出来了，也很难适应在那的工作与生活。之后，杜博妮搬到了爱丁堡，担任爱丁堡大学的东亚研究教授。在这期间，她完成了《两地书》的翻译，这是一项伟大的翻译成就。后

来，杜博妮又回到了悉尼，在母校悉尼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继续从事着翻译工作，和其丈夫一起继续翻译董启章的作品。

杜博妮坦言：“我翻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因为我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偶然发现了这本书，这本书解决了中国文艺革命的方向问题，是一部非凡的作品，可以加深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我希望通过翻译这本书让外国人更好地理解感受毛泽东的政策是如何受到中国人民赞赏的。”杜博妮以历史研究为基础展开译介，把翻译与汉学研究相结合，致力于让英语世界的读者明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意蕴。同时，杜博妮提到，毛泽东曾在北京学习了一些西方文学理论，所以西方读者理解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的讲话并不困难。杜博妮的译本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引发了很多人的阅读兴趣，也被重新出版多次，并广为宣传。杜博妮提到，她在选择作品翻译之时完全是出自自身兴趣，她喜欢有深刻内涵的作品，敬佩毛泽东的文字力量。

在悉尼大学求学阶段，杜博妮深受戴维勒斯教

授的影响，戴维勒斯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翻译家，翻译了许多优美的诗歌，他的翻译作品很受欢迎。正是戴维勒斯告诉杜博妮应该翻译中国现代文学，戴维勒斯推荐了诗人何其芳，所以杜博妮选择了何其芳的散文诗歌来翻译。杜博妮的翻译著作《梦中道路：何其芳散文诗选》十分尊重原文，但并不拘泥于原文。这本译著是较为系统完整的英文译本，还很好地传达了原诗的内蕴。杜博妮在翻译之时，将何其芳散文诗歌置于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展现何其芳散文诗歌的美学意蕴。她以汉学家“他者”视阈进行翻译，既有双语的专业素养，又有汉学家独特的文化眼光。此外，翻译何其芳的作品也影响了杜博妮后期的博士论文写作。

谈及翻译，杜博妮说：“人们在翻译过程中的经历是十分迷人的，我喜欢思考并书写这些经历，我对翻译经历的探索甚至比探究翻译的本质更加感兴趣。”2010年，杜博妮搬回了悉尼，她出版了一本关于“翻译领域”的书籍《当代中国翻译地带：威权命令与礼物交换》。这本书不是一本

翻译理论的书，而更像是一本历史书。在这本书中，杜博妮指出，中国文学的外译类型分为四大类，即学术翻译、国家翻译、商业翻译、个人翻译。她还结合自身的翻译历程，来解释自己所处时代翻译的历史现象，主张关注中国翻译活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杜博妮探讨中国应该怎样在世界范围内介绍自己，才能让不同语言国家的人更好地理解中国。她认为，应该让更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生活，源语言国家的生活经验对于译者来说无疑是重要的。对于想要翻译中国文学的译者而言，能有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当然是更好的。源语言国家的生活经验有助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展现真实的中国，有利于中国文学“走出去”。她认为，如果中国政府能给予这些人帮助，无论是资助译者来中国访问还是助力于译者与出版社进行合作交流，都十分有利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都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徐宝锋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佳熹系北京语言大学在读博士)